

“废考运动”与学校考试改革

王伦信

[摘要]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教育”观念的流行和学生自主意识的觉醒,引发了人们对考试现状的不满和思考,发展为“废考运动”。同时,以教育、心理测量学为基础形成的科学考试理论,作为西方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入中国,掀起了测验运动,并倡导运用教育测量学的原理对传统学校考试进行改革,提倡“新法考试”。经过多年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校考试的科学化改革。

[关键词] “五四”时期;废止考试;新法考试;教学改革

“五四”运动之后,当人们对传统考试丧失信心而呼吁废止考试,发起“废考运动”的时候,教育、心理测量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考试理论被引入进来,由此引发的测验运动几乎与“废考运动”同步达到高潮,如何改革学校考试也自然成为倡导测验运动的学者们关注的对象。经过多年的探索,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促使考试在鉴定学生学业成就,激发学生学业动机,诊断学生学业问题,考查教师教学效果,以及与教学过程的结合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一、“五四”时期关于废止学校考试的争论

自1920年初开始,我国教育界就学校考试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形成了所谓的“废考运动”。这场争论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科举时代以书本为中心,习惯以纸笔考试和策论式题型考查学生学业的传统考试方法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以来至“五四”时期的学校教育,不适合重视观察、理解和实验的近代科学知识内容的学习。但是,近代新式学校和科举考试此消彼长的历程中一直存在的对科举和科举式考试的批评,紧接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直接揭橥以“废止考试”的主题,则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是“五四”运动所激发的学生群体张力和自主、个性意识的释放。袁世凯执政期间,为配合其独裁政治和帝制复辟的用心,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封建回潮势头,学校及教育当局也强化考试在教育管理中的作用,频繁的考试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废考运动”中学生对考试的抨击一定程度上是这种长期压抑的情绪的宣泄:“升学的有初试、复试、面试、口试、甄别试等;升级的有日考、月考、期考、年考等。我们活泼的心思,绝大的志愿,入学以后,就朝朝夕夕的为考试忙个不停,全

王伦信,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没有点机会活动我们的脑子和身体,应用我们的心思和学问,实现我们的志愿和期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脑子也变钝了,心思也变笨了,志愿也灰了。故这种学校的考试,就是缓性的、变相的‘科举’啦!”^①

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教育模式的设计开始由师法日本转向师法美国,特别是杜威来华讲学,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想象中美国宽松自由教育精神的向往。杜威于“五四”前夕来华,紧接着展开了一系列风靡全国的演讲。1919年6月17日至21日,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所作主题为《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中,批评旧的知识论在教育上发生的恶果,其中在教学方法上表现为注重记忆、注重背诵、注重考试。他在演讲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有一种农家,养鸡鸭出卖。卖的时候,常常把鸡鸭喂得饱饱的,可以多卖一点钱。但是鸡鸭喂饱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们特地造一种管子,插进鸡鸭喉咙里,把食物硬灌下去。使它们更胖更重。现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装食物到鸡鸭肚子里去的方法。考试的方法,就好像农夫用秤称鸡鸭的重量,看它们已经装够了没有。”^②这一比喻成为“填鸭式教育”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关于旧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关系的描述也成为后来“废考运动”中批评学校考试的一个重要材料,乃至有人将其作为“废考运动”的引线:“自杜威博士来华讲演之后,学界里就有很多人——自然是被考的学生们占大多数——发生了‘废考’的狂热症,竭力从事于‘废考运动’”。^③

1919年11月在《南洋周刊》第14期上发表吴保丰《废除考试》一文,揭开了这场“废考运动”的序幕。《南洋周刊》创刊于“五四”运动高潮平息之后的1919年7月,刊物以号召青年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为主旨,提倡平民教育、劳工至上和改革的思想。^④交通大学的学生是该刊重要的作者群体,《废除考试》的作者即是交通大学沪校电机科的学生,他在这篇约3500字的文章中,论述了考试对学生品性、课业、辨别能力、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弊害。^⑤吴保丰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和学生群体的共鸣,如1919年12月钱穆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揭示考试违背教育本义,以考试得分计较学生优劣的错误。钱穆对当时考试计分法的批评,如指出将学生数科成绩得分,作“混合平均之计算,以定学者之优劣”^⑥的批评,虽然只是一种经验性的论述,但实已切合现代教育测量学的基本原理。1919年底鲍瞻在《大世界》上发表的《学校考试制宜废除说》;^⑦1920年1月16日北京大学学生宋我真给时任《民国日报》经理的邵力子写信,历数学校考试的弊端,如增懒惰性,养成侥幸、虚荣和忌妒心,叫人作伪,损害健康和导致学业退化等,同时诉说自己欲放弃考试,但又担心因此得不到文凭,失去出洋留学机会的苦楚。^⑧

1920年1月23至30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八期连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颜保良《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一文,北大校长蔡元培专门为此文作按语,并“请本校同人发布意见”。颜保良文章认为,无论是升学考试和升级考试,其弊端都在于只注重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而非理解能力,束缚学生的思维发展,达不到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和招收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目的。他提出在专门以上学校全面废止校内考试,代之以学生各种成果的发明和发表来考察学生的在校学习成果,以各科研究所,学艺会等引导学生研究,并通过言语表扬、奖状、学位等名誉的以及版权、制作权、奖金、特种权利等有利益的奖励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提供图书馆、博物院、研究室,并有丰富的图

① 颜保良:《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4日,第3版。

② 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续),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6月30日,第1版。

③ 孙德中:《对于考试问题一点平庸的意见》,北京:《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1期。

④ 观海:《今后青年的责任》,上海:《南洋周刊》1919年第1期。

⑤ 吴保丰:《废除考试》,上海:《南洋周刊》1919年第14期。

⑥ 钱穆:《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上海:《教育杂志》1919年第11卷第12期。

⑦ 鲍瞻:《学校考试制宜废除说》,上海:《大世界》1919年12月30日,第2版。

⑧ 《废考问题的商榷》,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4—505页。

书、设备供学习、研究和实验。中小学则“留一部分的考试，律学生用功和练习其自然的记忆力，废止一部分考试，使学生有大部的精神和脑力自由发展其身心。”^①比照专门以上学校建立指导学生用功的组织，可通过制作、批评、采集、评述、报告、讲演等来展现学生的成果，以各种名誉和利益的手段（如免膳费、学费等）来奖励表现突出的学生等。提供充分的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学校园、标本陈列室等供学生学习。全面废止升学考试，代之以通过考察学生本身之资质、品行、志愿、体格，以及家庭之人口、职业、财产等，以确定学生升学与否和升入何种学校何种专业。

颜保良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得到创刊于1920年1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多篇文章的呼应，一时“废止学校考试”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了研究考试制度的临时委员会，北京大学学生也发起成立废止考试研究会，声称“考试制度没有存在之必要，已为一致之主张。”^②紧接着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朱谦之发表了《反抗考试的宣言》，他引用杜威在北京美术学校演讲中对于考试的批评，宣告今后再也不参加“称鸡鸭式”的考试，并呼吁反感考试的学生，起来对考试表达“同声反抗”，并“请诸君把考试的‘笔’抛去！”^③这些激昂的文字，对“废考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废止考试”的声音频繁见于报章杂志，每到学期末，学生因要求废止考试而与学校当局对峙的新闻也不时见于报端。

这场以北京大学学生为生力军的“废考运动”，因与现代文凭制度的抵触而渐趋平息，按照“五四”后曾短暂代理北大校长，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的说法，即“（一）没文凭，没考试；（二）要文凭就要考试。”^④但是，“废考运动”所引起关于学校考试的争论一直延续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争论中虽以对学校考试现实的批判为主调，也就如何改革现有考试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如对传统考试评分和记分方法的质疑，认为“所施行的评分法，不足为测定教育效果的标准。”^⑤提倡以符合现代学术精神的方法如通过学生的论文、绘图、试验、演算的成果，或在调查、讨论、制作中的表现来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⑥有些还就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等方面提出了建议。^⑦

二、科学化考试理论的引入及对改革学校考试的探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基于实证科学的迅速发展，欧美教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取向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受到以美国的霍尔，德国的莫伊曼与拉伊，法国的比纳以及美国的桑代克等为代表的实验教育学派心理学和教育学家的引导和推动。^⑧他们认为只有精确地测量出教育所促成的变化，才能改进和完善教育的方法，教育才能成为一门可以量化和实证的科学。他们的主张促进了对考试的科学化的探索，催生了一门新的教育学科——教育测量学。

1918年，从美国访学归来的俞子夷根据汉字书法的构造原则，编制四种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并用于实测，成为我国最早编制并在教育实践中使用教育测验量表的人物。1919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受聘于南京高师的陈鹤琴、廖世承等人，以他们在美国接受的系统教育和心理测量学知识，开设测验课程，转译和编造各种测验量表、发表文章和演说，出版著作等，真正从学理上将教育和心理测量学科引入中国。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测验专家麦柯尔（W·A·McCall）来华，指导编制各种应

① 颜保良：《我们对于“废止现在学校考试制度”的意见》（五续），北京：《北京大学日报》1920年1月29日，第3—4版。

② 《废止考试研究会之发起》，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2号）1920年3月21日，第11版。

③ 朱谦之：《反抗考试的宣言》，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3月28日，第5—6版。

④ 《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君与蒋梦麟教授来往函札》，北京：《北京大学日报》1920年3月30日，第2版。

⑤ 迟明：《废止学校的考试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4号）1920年1月25日，第1版。

⑥ 建功：《考试废止后，我们怎么办？》，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5号）1920年4月11日，第10—11版。

⑦ 黄琛：《我对于废止考试的教员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5号）1920年4月11日，第11—12版。

⑧ 赵祥麟主编：《外国现代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8—127页。

用测验,到各地学校测试,推动测验运动走向高潮。

与主张“废考”者对考试的否定态度不同,测验运动的学者希望运用教育测量学的原理对学校考试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方案,正如廖世承所说:“现时废止考试的论调时常在书报上看见,至于怎样改良考试,改进记分,讨论的人却比较的少些。我们觉得教育事业应言积极的研究;消极的非议,于学理上、事实上,贡献并不多。所以我们愿意多做些实地研究的工夫,把研究的结果报告出来,预备各校去继续改进。”^①测验运动的学者认为,人们对考试的厌恶和绝望主要缘于传统考试存在深度取样,试题过少,偏于主观,不能反映教学的目标要求和学生掌握知识的全貌,答案不确定,教师评分缺乏客观标准等缺点。

确实,我国自近代兴办新式学校以来,知识体系虽得到了更新,但考试题型结构受科举八股文,策、论等形式的影响,题型单一,无论是入学升学考试,还是学校的定期考试,几乎是一色的问答论述题。如洋务时期的京师同文馆,其1872年岁试题,算学、化学、格物(中、英文各一套)、医学科五套试卷,除算学间有算式题外,其余全为问答或陈述题。^②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各学堂章程考试章程》规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于民国初年的大学预科)的毕业考试分外场和内场进行,外场即在学生就业的学堂考试,内场“试以策、论、考、说文字,应就该学生已习之中国经史文学及西学各科学中,分场发题考问,观其识议是否纯正,文理是否优长。”又进一步说明内场分两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③这种题量少,结构单一,以深度论述为主,并严格规定题型与考试科目对应的方式,不仅难以反映学生对近代学科知识掌握的不同认知层次要求,也极易引导学生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这种考试方式,也体现在清末学堂的日常考试中,如1908年钱穆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他的历史老师吕思勉,在一次考试中,出四道题,每题以25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④这虽然常被作为对人才评价之不拘一格的佳话,但也反映了当时考试题型之偏狭,教师评分之主观随意的事实。

这种考试现状至“五四”后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出题者凭自己的喜好出题,导致考试成绩存在严重的偶然性偏差,导致对入学考试的严重不信任,有所谓考试衡命而非衡文的说法。如杨庆1924年在其《大学入学试题之改良》中列举1923年北京大学预科之中国史试题,仅有两题:(一)说明天津教案之原委;(二)清朝文字大狱有几?试略述之。^⑤他批评不仅试题偏狭,集中于清代一朝,完全无视其他朝代的历史知识,所考知识的琐细程度也不能反映普通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他还指出在其他学科和年度的入学考试中普遍存在同样的现象。

在对旧的学校考试进行检讨的同时,学者们开始借鉴心理、教育测验的编制经验,尝试对学校考试进行改造,提出“新法考试”的概念。应该说,我国测验运动开展初期,所引入和编制的成套心理、教育测验题主要是用以说明测验原理,属于标准化测验,在实践中主要用于大型心理和教育调查,以便掌握学生情况,了解教育程度,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效果等。但这些测验的内容、目的并不能与教师当时的教学情形相结合,不能完全满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随时考查学生的需要。当然,“新法考试”是相对于“旧法考试”而言,其“新”的意义在于编造新法考试的原则应参照标准化测验,试题应体现准确、可靠、客观的精神,但又不必像编制标准化考试那样要求进行试测、建立常模、检测信

①廖世承等编:《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页。

②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83—86页。

③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9—510页。

④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0年,第45—46页。

⑤杨庆:《大学入学试题之改良》,连载于《晨报副刊》(北京)1924年9月3—4日,第1版。试题亦见于《北京大学日记》1923年8月4日第3版《本校本届预科新生入学试验各种试题汇录·历史》。

度与效度等,是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工作,随时根据需要自编的一种考试。

在“废考运动”发起不久,一些测验运动的学者就提出依据科学考试理论对学校考试进行改革。如1921年秋,由“平民教育社”举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张耀翔主讲的“新法考试”讲座,前往听讲的北京中小学教师达数百人之多。^①廖世承也著文提出改良学校日常考试与学期考试的方案。^②他们都提供了“新法考试”如填字(填空)、正误(是非判断)、选择等一些基本题型的案例。特别是廖世承主持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1923年初一招生和初二插班招生考试中,在命题上采用“新法考试”的方法,并出版了关于这次考试的报告《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的小册子,^③对新法考试起到了详尽的示范作用。该考试分算学、默读(阅读理解)、常识、英文、缀法(作小短文)数种,试题采取广度取样的方法,题量多,如数学35题,虽然统一采用填写答案式,但内容覆盖了四则运算的次序、四则应用问题、小数乘除法、诸等法、日历问题、求素因数、化循环小数、分数应用题、折扣计算、单利计算、比例应用问题、分配问题、混合法等。语文分为默读(阅读理解)和缀法(作小短文)两大题型,而默读又分为文言默读和语体文默读两种。白话文默读题和文言阅读题各提供了六道大题,每大题提供一段文字,后附3至4个提问,每个提问包含3至4个答案,其中只有1个答案正确,要求挑出正确的答案。缀法测验即小作文,虽然偏于主观考试,标准难定,但也给出了在选词、造句、修辞、逻辑,达意等不同层次表现的作文样式,提供评分的标准。这次考试题型多样,有填空题、选择题、写作题等,不似以前之单一问答题。覆盖范围全面,回答简便。

“新法考试”克服了传统“旧法考试”深度取样,试题量偏少,覆盖面不广,答案不确定,不易作答,不易评分,教师评分主观等缺点。相对于“旧法考试”,“新法考试”主要表现为:(一)采取广度取样,试题容量大,覆盖面广;(二)是采用客观性试题,答案确定,评分方便。经过多年实践和对国外的借鉴,到1930年代形成了回忆式(答案简捷)、填字式、正误式、是否式、异同式、汇选式(选择式)、最好答案式(也是选择式的一种)、配合式、比喻式(又称同理式)、排列式、分类式等多种题型,^④全面偏向客观性试题。所以有人又将“新法考试”称为客观性考试,与此相对的旧法考试则被称为主观性考试。

“新法考试”丰富了考试的题型,这和近代学科多样、知识类型丰富,科学教学中要求学生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运用等不同认知层次准确掌握概念、理解知识内容体系,并能综合运用的教学目标相关。还可提供学生具有确定答案的试卷和作业开展自查自评,进行主动学习等密切相关。不过,学者们也提醒传统考试注重学生自由发表,在培养学生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可以弥补短答式新法考试题型的不足。

三、测验理论知识的普及和考试观念的更新

在1920年代测验运动中,一些著名的高等师范院校或大学教育科开设了教育测验与统计学课程。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所拟定的《新学制师范科课程标准纲要》中无论是含初中阶段的六年制师范,还是仅设于高中的师范科,都规定开设《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⑤一般为3学分。但当时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课程设置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并不完全遵照课程标准纲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和整顿各级各类学校的文件,1930年11月教育部颁行

①《新法考试》,连载于《晨报副刊》(北京)1921年11月9日至16日第1版;燕生:《新法考试的先决问题》,上海:《教育杂志》1924年第14卷第14期。

②廖世承:《改良平常小考与学期考试办法》,上海:《教育与人生》(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1924年第29期。

③廖世承等编:《测验与入学考试的改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④陈选善:《教育测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56—170页。

⑤舒新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上海:《中华教育界》1926年第15卷第11期。

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高级中学师范科之部》中,《教育测验与统计》作为必修课程,颁布了《高级中学师范科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暂行标准》,^①明确学习目的和内容。1933年颁布《师范学校规程》,1935年经修订颁布《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课程设置进一步稳定,将师范学校“教育测验及统计”课程作为必修课更稳定地确立下来。并拟定《师范学校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②对该课程的目标、课时数(一周四课时共一学期)、教学内容大纲、教学方法作出了规定。“教育测验及统计”课程的普遍设立对普及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测量学知识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1930年代陆续编订出版了数种教材,经教育部审定,较有影响的有潘之赓(世界书局,1932)、朱君毅(商务印书馆,1933)、王书林(正中书局,1935)等先后编写出版的《教育测验与统计》同名教材,尤以朱君毅编写的《教育测验与统计》最为流行,从1933年初版到1947年已重印十三次之多。专门面向简易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的有汤鸿翥的《教育测验》(大华书局,1933)等。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标准化测验的知识,此间还出版过《教育测验ABC》、《教育测验讲话》等通俗性读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学生能了解编制教育测验之方法及步骤”,各教材都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学校各科测验题的编制,特别是“新法考试”的特点、题型和案例。

为推进“新法考试”的开展,向教师介绍编造新法测验的技术,中国测验学会主办的《测验》杂志于第一卷(1932年)第二期出版了《新法测验专号》,发表了陈选善等多位致力于考试改革的专家学者的十篇文章,分别为《旧式考试与新式考试的比较》(陈选善)、《分数及记分制度》(萧承慎)、《什么是新法考试》(吴南轩)、《怎样考查学生的成绩》(陈剑恒)、《实行新考试法的先决条件》(潘菽)、《编造新法试题的方法》(龚启昌)、《优良的考试之特征》(史美煊)、《冀鲁豫晋四省高中以上学校英语成绩考察记》(艾伟、郭楠、汤鸿翥)、《儿童中心教育与考试》。这些文章从理论上阐明“标准化考试”、“新法考试”与“旧法考试”的不同特点,新法考试的教育价值取向和实施条件,介绍新法测验的编制方法、案例与讨论,合理的记分方法等。

1930年代,还出现了多种专门讨论新法考试的编著和译著。如史美煊编著的《考试新论》(民知书局,1933),是较为集中的反映1920年代以来新法考试研究成果的一本著作,内容主要包括新法考试的意义价值,优良考试所应有的效度、信度指标,及其客观性、广博性、便易性、针对性、融洽性(如各种题型的恰当组合)等特征,新、旧法考试的优点、局限性及旧法考试的改良与利用,新法考试的题型及各类新法考试的编制与实施等,以及各种记分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讨论等。在对新法考试知识的介绍过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亚尔保德·兰(Albert R. Lang)所编著的《新法考试》^③一书,因其内容的通俗性和系统性特点,而广为国内测验学者征引,1934年,出现了赵廷为、刘真的摘译本《新式测验编造法》,重点介绍了其中的有关新法考试的特征、题型及其编制方法,以“供作一般教师编造新式的客观测验时的指导”。^④1935年,又出版了由浦漪人、黄明宗合译的全译本。^⑤这些编著和译著,对新法考试知识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废考运动”中的争论和科学化考试探索的重要影响,不仅在于从试题编制方面改进学校考试的技能,还在于从拓展对学校考试的功能认识方面促进考试观念的更新。在传统考试中,人们对考试作用的认识普遍局限在检查学生的学业程度,起到督促学生学业的作用。科学化考试的应用,拓展了考试的功能。“夫学校考试之新功用,不偏重其结果,乃趋重其历程。……要使人受考试,所以别优劣

①《中小学课程标准》第5册《高级中学师范科之部》,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154—159页。

②《师范学校教育测验与统计课程标准》,《教育部公报》(第七卷)(1935年),第15—16期,第42—49页。

③Albert R. Lang, *Modern Methods in Written Examin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0.

④赵廷为、刘真:《新式测验编造法》译序,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2页。

⑤[美] Albert R. Lang:《新法考试》,浦漪人、黄明宗译,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

而便于施教也。了解本能之不同,而知所以尊重个性也。因兴味之不齐,而得各攻其所专也。”^①其中考试的诊断性功能得到特别的强调,1934年,陈选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萨孟司(P.M. Symonds)关于学校考试的15个功能,除鼓励学业,增进竞争(包括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已往成绩的比较),决定升降和升学,进行奖励等传统功能,更指出让学生自己和家长了解学生的成绩,诊断学生的缺点和弱点,确定教学的优势,作为教育指导与职业指导的根据,评判教员的效率,推测学生将来的成就等诊断性考试。^②

促进测验与教学的结合,使测验成为教学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课程设计,也是考试观念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使考试“变为教授之一部分,使试验寓于教授之中,辅助促进教授之进行”。^③到1930年代,练习测验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已经比较普遍,被认为是“将测验工作与教学工作打成一片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数学学科的答案客观性强,我国较普遍地在算术教学中采用练习测验,1930年代,其他学科如读法中也较多采用,综合训练学生的识字阅读能力。在算术测验中较为著名的有《马静轩儿童算术练习测验片》。该练习测验提供小学一、二、三年级算术四则运算的练习和效果考查,整个测验共九十课,其内容次序根据学习心理的原则从易到难排列。每六至七课为一单元,每单元的最后一课为测验,共十四单元。前一单元的测验不及格者,则不能进入后一单元的练习。整个测验卡纸在印刷上采用习题纸、答题纸、标准答案纸分开套印的方式,学生可以自己练习,自己评分。习题纸、标准答案纸可以重复使用。^④这种练习测验的练习题和测验题具有帮助诊断学生学习困难、激发学习动机、促进个别学习的优点。

应该说,将练习、测验贯穿到学习过程中在1920年代引入的欧美各种教学法实验中已得到充分体现,文纳特卡制就是其典型代表。1930年代,练习和测验卡得到了更多的应用,进一步将练习和测验融入到课程设计中,密切了测验和教学的关系。如当时推荐采用的一种适应分组研究和个别学习的常识科研究和测验卡。^⑤整套卡片由指导卡、测验卡(问题卡)、量表卡(答案卡)、答案纸(答题用的普通薄纸)。指导卡上标明研究的中心主题(如历史名人孔子),可参考的资料,研究用时,研究的问题分析和作业要项等。测验卡(问题卡)将中心主题细化为若干个极具体的问题,量表卡(答案卡)则是列出测验卡所示具体题答案。同一中心问题的所有卡片和答案纸用同一编号,小问题题号一一对应,指导卡、测验卡、量表卡可重复使用,学生通过自我学习,答题、自测评分,订正,达成学习目标。1920年还较为罕见练习测验卡片,到1930年代则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开发,集趣味、练习和效果检测于一体,这可以说是考试观念的变革对课堂教学的重要影响。

四、结束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废止考试”运动和测验运动,虽然在批判和建设的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拉开了我国近代考试现代化改革的序幕。到1930年代,我国考试的现代化改革无论在学理探讨、知识普及,还是在与实际教学的结合上都取得明显的成就。

我国1920年代开始的学校考试改革旨在克服传统论文式考试的弊端,适应重视理解的近代科学知识内容的学习,因此考试改革的基本趋向是广度取样、题型丰富、答案简明客观,评卷方便等,即所谓新法考试。新法考试有其局限性,传统论文式考试亦有所长,但在大众认知层面,新法考试的特点

①杨荫庆:《考试之新功用》,北京:《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

②陈选善:《教育测验》,第146—147页。

③杨荫庆:《考试之新功用》,第126—127页。

④陈选善:《教育测验》,第117—119页。

⑤朱鸿翔:《常识科的研究卡和测验卡》,上海:《教师之友》1926年第2卷第8期。

往往被误解为试题的纯客观性、答案的统一化、机读评分等表层特性,被理解为机械化和呆板化。近年来,我国考试实践中,特别是高校自主命题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存在题型单一,纯主观性论述题,取样偏狭等现象,甚至出现年度试题大量重复的个别案例。因此,回顾“五四”后我国学校考试改革的历程,了解前人曾经付出过的努力,对加强考试的科学化研究,提高考试的专业水平,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Examination Abolishment Movement and Examination Reforms in Schools

WANG Lunxi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concept of new educa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students' self-awareness aroused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reflection on the then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later developed into a movement to abolish examin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scientific examination theory based o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eory. This thus led to the movement of developing new tests, advocating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schools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fter several years' development, this movement strongly promoted the scientific reform of schoo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May 4th Period; examination abolishment; new examination system; educational reform

About the author: WANG Lunxin,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Facul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